

摘要：“传统创新”是对立的统一，它以一种方式被一般经验之中。1. 个体或集体在其中一个方向视其优势而另方劣势。例如我参照古人，谴责今人，或之参照今人，谴责古人。这是以身份属的弊端。2. 由于会出现不同的时期，这种重复产生普遍性的问题。从过去经验中某文化作为新体中能够因需要保留它再利用，不过这种也能效在种情况下需要造的行为。在传与创新的立立下，我们保留保持再用或探索改变创造，从个人行为来调整人类普遍性。3. 如此来，传与革新本身没有区分，只是调整连接的方式。为此，我们需要创造为可能符合同域情境人员的特性。对这种普遍性进行一般塑造了道德规范。任何教学，尤其是语言教育和艺术教育，有很多工作做，实现多面的道路很长。与宗教和过去传统保持距离，去常接触种定有权威文化。同时，抵抗经济利益的多惑，现今一种自发生，高更新，甚弱，强文化保护的唯一的做事是在以前。

关键词：传统、创新、历史、现代性、人学、伦理、持续、适应、伦理教学

**Présentation en chinois par Madame Zhijie WANG, Mdc Langue et Culture chinoise,  
Univ. Evry (France)**

法国跨文化传播理论研究 2010 年新作简介 ( 王志杰 )

***Complexité des cultures et de l'interculturel. Contre les pensées uniques, 2015, 5<sup>ème</sup> édition.  
Paris, Economica.***

Les cultures et les relations interculturelles résultent de différences affectives, cognitives, comportementales qui ont été construites au cours de l'histoire des pays et des peuples. Il y a « *complexité* » car ces différences multiples et variées composent des identités nationales et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Les comprendre, les pratiquer, cela exige connaissances et apprentissages. L'ouvrage présente trois perspectives, trois méthodes, six approches pour y parvenir. Il permet d'éviter les caricatures produites par les « *pensées uniques* » réductrices.

« 文化与跨文化的复杂性 - 摒弃单一观念, » 第四版,

雅克. 德莫尔宫, 2015 年. 巴黎, Economica 出版社

不同国家与人民的历史长河培育着人们不同的情感, 认识和行为, 由此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和跨文化关系. 所谓« 复杂性 », 因为这些变化多样的差异主体代表了各民族和国际关系. 理解并实施这些差异的共处需要认识, 学习与实践. 本书旨在介绍三种前景, 三种方法和六种途径以实现这一目标. 它可以帮助人们避免 简化 « 单一观念 » 带来的局限与片面.

\*

***Déjouer l'inhumain. Avec Edgar Morin, 2010, Paris, Economica.***

Les humains sont divisés en sociétés construites au cours du temps. Seule une vision « *systémique* » – relationnelle et dynamique – de l'histoire humaine, permet aux sociétés de se distinguer, de s'opposer mais aussi de s'associer. Elles pourront demain produire ensemble les richesses scientifiques, techniques, économiques. En évitant les affrontements inhumains, elles conduiront le développement constructif de la planète humaine, vers la « *Terre Patrie* » définie par Edgar Morin.

« 消除非人性, - 解读艾德卡. 莫兰»,

雅克. 德莫尔宫, 2010 年, 巴黎, Economica 出版社

时间使人类分解为不同的社会. 只有对人类历史用 “系统科学” - 关系与动力的科学方法, 才有可能使各社会认识其差异, 加以比较并相互配合. 将来共同创造科学, 技术与经济财富, 使整个人类趋于建设发展之路, 消除非人性冲突, 实现艾德卡. 莫兰提出的 “地球祖国” 理想.

\*

**RAPPEL : un article de Jacques Demorgon**

**« Les sports et les Jeux Olympiques dans le devenir des sociétés**

**Des Grecs à la mondialisation olympique actuelle »**

Publié dans *Synergies Chine* n°4/2009, pp. 173-186 peut toujours être consulté en ligne sur le site du GERFLINT

摘要：如果要深刻理解体育和奥林匹克的意义，我们应该从长远的历史角度来看。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社会形式在改变，同时经历关键时刻。此时，体育发挥了重要的协调作用。在部落向王国转变的时期，希腊人发明了奥运会，但随后又被基督教所禁止。在王国向贸易国转变的时期，英国贵族重建体育规则，并将之传播到其他国家。在向全球化转变的过程中，具有全球性的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皮埃尔·德·顾拜旦的倡导下诞生了。今天，我们在这项体育运动会中间应当认识到它是转变目前和未来暴力的“行动符号”。

关键词：悠久历史；社会变动；部落；城邦；国家；全球化；暴力；体育协调；行动符号；皮埃尔·德·顾拜旦

Abstract: Sports and the Olympics should be observed in a long perspective of History if we want them to be understood in depth. As human societies grow, they evolve and face critical times. Sports have played a role of mediation in these critical times. The Greeks invented the Olympic Games in the time when tribes became kingdoms. Olympics Games have been forbidden by Christianity. British Aristocracy recreates sports establishment which spilt over into other nations in the time when kingdoms became trading nations. Pierre de Coubertin puts Olympics Games again into world perspective in a time when nations move to globalisation. We should now understand the mediation through sports as “as symbol in action” which transforms violence in present time and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Long perspective of History, evolution of societies, tribes, kingdom, trading nation, globalization, violence, mediation through sports, symbol in action, Pierre de Coubertin.

Résumé : Comprendre la signification profonde des sports et de l'Olympisme requiert de les voir à l'oeuvre dans l'histoire longue. Au cours de leur croissance, les sociétés humaines changent de forme et connaissent alors un moment très critique. L'institution sportive est l'une des grandes médiatrices de ce moment. Dans la mutation des tribus aux royaumes, les Grecs inventent les Jeux Olympiques ensuite interdits par le christianisme. Dans la mutation des royaumes aux nations marchandes, l'aristocratie britannique réinvente les sports institués qui gagnent les autres nations. Dans la mutation actuelle des nations à la mondialisation, les Jeux Olympiques modernes sont réinventés dans une perspective mondiale avec Pierre de Coubertin. Nous, qui vivons au coeur de cette médiation sportive, devrions enfin la comprendre comme « symbolique en acte » d'une conversion des violences en cours et à venir.

Mots-clés: Histoire longue, mutation des sociétés, tribu, royaume, nation, mondialisation, violences, médiation sportive, symbolique en acte, Pierre de Coubertin.

# 建构跨文化传播新理念，担负人类未来

雅克·德莫尔宫

在传统跨文化研究中，人们常使用“跨文化”这一词语，可是人们往往会孤立地去理解，缺乏实际意义。须知“跨文化”一词涵盖的层面极为广泛，只是在实际使用时被缩略了。人们只注意到其较为敏感和实际的一面，具体地说，仅涉及跨文化关系及合作等方面。实际上，人类交往中饱含着文化的交融，跨文化涉及方方面面。几千年前，游牧民族和定居民族的接触曾遇到了极大的冲突。以至于位于罗马帝国和中华长城等跨文化的典型边界如同“挫齿”。当蒙古人、满洲人征服中华帝国的同时，他们也同样受到极大挫伤。可是，传统跨文化理论产生于忽略这些极其残酷的跨文化现实，它的宗旨是无暴力和良好愿望，似乎从不存在暴力跨文化历史。显然，这是背离事实的错误看法。

传统跨文化理论无力对暴力跨文化提出挑战，这毫不奇怪。因为仅仅只调整移民区域、国际工作团体及世界调解机构中的人与文化因素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从宗教、政治、经济及信息等各个领域的对立范畴予以调整，从社会形态方面予以调整。部落化、王朝化、国家化及世界化等各个社会形态并没有随着历史演进而消失，而是以深层文化潮流的形式共存于当今。

## 一、调适、“人类再分解”与传播

传统跨文化传播理论无法将跨文化史实与主观意愿加以联系，这不难理解。因为要做到

这一点必须有两个前提：审视人与文化的关系、审视人与团体与社会的关系。与此同时，还必须找到能够正确审视这两层关系的钥匙。钥匙在哪儿？我们只有从人类特殊的调适传播能力中找到钥匙。不幸的是，传统观点将调适能力的涵义大大缩小，仅理解为简单地妥协于现实，从而几乎把这条路堵死。相反，关于这一点，爱力克·本尼(Eric Berne)早在 1970 年就指出<sup>1</sup>，调适包括接受、反对或/和更新。换句话说，调适不是解决问题的机械方法，而是可以探讨研究的途径。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人类调适传播能力问题探讨的根源来自人类再生的结构基础：“人类再分解”。一般地说，在生物世界，第一次分解为形体分解，人以类聚，物以群分；人类会再次分解，人的再次分解则往往不涉及世界，不涉及它种，也不涉及自身，而由代表他的文化、思想来完成这种分解。

## 二、针对性适应-调适传播：人类的重要使命

这次分解有可能改变各种现状，从而不断出现多种适应形式和相应的传播问题。深刻了解这些反映针对性适应-调适传播史实的结构非常重要，因为人类与其文化深层关系的钥匙就在其中。当人类处于整体时，其文化不可能分化。反言之，他们之间的深层渊源远远超过其差异。面对诸如“关闭-开放”，“维持-改变”，“集中-分散”，“一体-多样”等等对立现实，人类可以选择某一极端，但是事实上更多地是将其合成、协调，调整其状态及程度，避免绝对化，以增加适应性，而非绝对简单的“全开放”或“全封闭”。

我们有必要正确理解这种针对性适应-调适传播的特性。它并非被动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针对不同时间、地点和环境而采取甄别、调整达到适应的一张王牌，也是人类创造发展社会不可战胜的极为高明的工具。

皮亚杰(Jean Piaget)<sup>2</sup>于 1976 年曾从两个方向阐述了调适问题：自身调整和协调外界。自

<sup>1</sup> Berne, E. (1970). *Analyse transactionnelle et psychopathologie*. Paris: Stock.

<sup>2</sup> Piaget, Jean (1967). *Logique et connaissance scientifique*. Paris: Gallimard.



身调整，即将自身思维加以至少是局部的调整，以适应世界及环境等的客观要求；协调外界，即将自身思维投放于世，以求其与环境吻合协调。在这两者间也同样存在把握分寸和尺度、对应不同环境、求得协调平衡等问题，皮亚杰把这样一种平衡的创造称之为“智慧”。

在建立人与文化的关系中，针对性适应-调适传播必须注意本文化与跨文化两层关系。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下一节里专门论述。

这种针对性适应-调适传播除了探讨人与文化的关系外，还须解决与地理历史相关的关系问题，本文第四节将探讨这一问题。

在本文第五节里，我们将阐述针对性适应-调适传播的另一个问题：人与团体、社会间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将涉及以下三个层面：行为及各项活动的调适，宗教、政治、经济、信息等各领域间的调适，部落、王室、国家、世界等各社会形态间的调适。这是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我们将逐一论述。

首先，我们在这里看看以下两个例子，确认调适传播对人类及其文化从生物学到社会学的重要性。

例一，“开放与封闭”。生物学认为，不同生物种类个体间具有不可衍生性。可是，截肢外科却不断打破了“免疫系统深度封闭”这一概念。心理学则从关闭到开放设立了多个递进“层次”：敌视、隔离、冷漠、同情、友好、爱慕、知己。在国家之间，“开放与封闭”被用于国界或信息界，而经济领域里这一概念则与经济保护主义和交换流通相连。

例二，“维持与改变”。生物学里用它来描述体温的改变与恒定，或是眼球瞳孔感光度的增强与缩微。在心理学里，它用来描述个体变化的缓慢进程与突变。社会学里，它却反映着传统与现代、保守与创新。往往，最终的结果并不是简单地摒弃或保留，而是改变某些成份，保留某些成份，以适应今天的需要。

#### 四、调适传播与其文化历史根源

在我们探究调适传播的根本特性之前，有必要回顾一下著名社会心理学家霍尔(Hall)和霍夫斯塔德(Hofstede)等关于跨文化传播的论述。他们往往从对立的角度审视世界跨文化传播现象，比如“远距离与近距离”、“现实利益与长远利益”。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学者最终围绕这些对立面把民族文化分级列表，甚至加上具体级别差距数字。由此，这些民族文化的特性便可能列入教育方案。

这样定论忽略了人类根本的调适特点，掩盖了各文化针对各种历史状况采取对应调适后产生的变化。这些学者同时也忽略了文化差异形成的地理历史根源<sup>3</sup>。霍尔承认<sup>4</sup>，在“显性”和“隐性”两极传播中存在调适。然而，他没有进一步研究历史上这种调适如何导致了法国、日本的隐性传播，又如何造成德国、瑞士和美国的显性传播。

要了解这些，我们必须理解以下几个关于针对性适应-调适传播与地理历史关系的要点。

只有当社会成员能迅速建立共识文化参照，这个社会才可能会出现频繁的隐性传播。而建立这一共识文化参照的前提是这个社会能逐渐在其历史演变进程中完善其统一。法国是这样，正如罗马帝国、天主教王国(驱逐异教徒)曾经做到的一样。日本亦如此，两个半世纪中严禁外国人进入。

当社会成员在自治政策下不断发展各种亚文化，这个社会便有可能出现频繁的显性传播。比如，在1648年法国路易十四当政前夕，德语国家大小共有350个，他们都有各自的文化。某个人若要出行，用本文化的参照与其它文化的人交往，常常会出现误解和不少问题，要想让别人理解，他们必须非常明晰地表明他们的想法和意愿。

各种针对性适应-调适传播往往相辅相成，比如固定与流动，外向与内向，社会政治文



化的同一与多样化·隐性传播与显性传播。多德<sup>5</sup>关于家庭结构的研究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比如德国显性传播问题·在德国历史上·一个家庭只能是一个孩子有继承权·其他孩子必须远离家园·到其它地区工作·安家·取妻·生子。很难想象·他们如何能够在其它完全不同的文化参照环境中生存。由此可见·一个文化的传播特点往往由这一文化群体的传播实践所决定。

但是这并不是绝对的。如果必要·处于隐性文化传播的人同样可以进行显性传播。比如·法国教师在向学生传授新学科知识时必须是“显性传播”；同样·处于显性文化传播的人也会在需要时实现隐性传播。比如·在德国家庭里·同样的背景使他们的传播常常表现为隐性。

根据霍夫斯塔德的“人脑思维形成”理论·文化在行动中可以变换·但是在思维中却不行。我们还可以参照另一种跨学科方法来理解这一问题：显性理解法。将人类行为科学与地理历史文化联系起来加以考察。

## 五、元传播与元认识：创造针对性适应——调适传播

针对性适应-调适传播是人类在历史中获得的经验·是“创建的史实”。它不是幻想而是现实·它体现了人类的智慧。寻求人类的共性并不完全符合人的个性本质·此外·这些共性也并没有完全被发掘·它只会随着人类智慧的创造而逐步被发展和发掘。这种智慧是人类唯一的共同源泉·它总在“不断发展·而永远无法完全分享”。它也是造成分歧与差异的原因。建立人类经验的共享便是元传播和元认识所担负的基本使命。著名语言学家雅各布森 (R. Jakobson) 在 1963 年清楚地阐述了传播中元语言的作用：它可以反过来保障交流中生产和接收信息的正确性。<sup>6</sup>

关于元认识·它涉及的并不是传播中的不足·而是对实物参照的不足。由此可见·调适

<sup>5</sup> Todd, E. (1999). *La diversité du monde. Famille et modernité*. Paris: Seuil.

<sup>6</sup> Jakobson, R. (1963). *Élément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Paris: Minuit.

并非针对人们的交流活动本身，而主要是误听、误表、误解。因此，调适研究的对象即是如何“正确地理解与思考”。从以下几个例子我们也许能够看到这种调适产生的基础。

十九世纪末页，范笛囊·妥尼(Ferdinand Tönnies)在其专著《团体与社会》<sup>7</sup>中指出，团体是社会最初的组合形式，随后才是社会。从广义来看，排除时间概念而言，这两者都是不可削弱的，只应保持其平衡。

随后，分别在 1977 年、1979 年和 1991 年，路易·杜蒙(Louis Dumont)<sup>8</sup>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提到了“整体社会”与“个体社会”。万桑·德恭伯(Vincent Descombes)1999 年评论说<sup>9</sup>，杜蒙的观点即认为这两者都不可削弱，而应保持平衡。由此看来，整体与个体一直是人类历史社会调适的主题之一。

富朗索瓦·于连(François Julien)在其中西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关于不同文化与社会差异问题也提出了“正确理解与思考”这一概念。他力图阐明调适问题。调适传播往往过去不被人关注，今天也可能难以正确理解，但是将来必须建立。虽然由于文化背景不同，事实真相会显得相当重要，但是，中国、印度或西方究竟谁把握真理的问题并不是关键，关键的是人们应该开启利用语言文化的财富和源泉，避免固执己见，走向误解，甚至导致灾难。

为此，于连举了一个例子。人类社会存在各种事物、人群及环境的差异，西方文化会因此建立起一系列二元对立的观念，如“个体-社会”，“专制-自由”，“平等-不平等”，“物性-人性”，“上帝-魔鬼”，“天堂-地狱”等等。而传统的中国或印度，则会就“谋计-破计”等对立面定义或是由“阴-阳”衍生出多个变数。于连认为，人类应该非常注重调适的创造方式，因为，这是人类用人性建立类同与差异的捷径。

<sup>7</sup> Tönnies, Ferdinand (1977). *Communauté et société*. Paris: Retz.

<sup>8</sup> Dumont, L. (1966-1991). *Homo hiérarchicus, Homo aequalis* I, II. Paris: Gallimard.

<sup>9</sup> Descombes, V. (1999). Louis Dumont ou les outils de la tolérance. *Esprit*, 1999(6), pp. 65-85.



## 六、从历史看未来：研究与建构世界跨文化调适传播

从历史上看，针对性适应-调适传播首先会发生在人类各项活动中，这些活动又会形成各个领域，如包括捕鱼、涉猎、放牧、农耕等活动的经济领域，欲在人间建立圣洁关系的宗教活动领域，政治、行政、军事活动领域以及包含技术、科学、媒体等的信息生产活动领域。这些活动领域的特点不同，价值不同，意义不同，人们的投入-针对性适应也不同，由此而产生的社会结构也不同。这些不同会带来冲突与对立。各领域间的调适比各活动间的调适更加复杂。比如宗教政治人士会利用统一这张王牌以王权替代部落社会。与此同时，他们也就掌控了经济和信息领域。当然，对手和异己分子会削弱这种王权帝国，尤其当经济信息界人士认为他们拥有更加先进的王牌，足以建立新社会时。事实上经济信息人士的确掌握了“现代化”王牌，于是代表商业工业化的国家体制便以新的形态替代了王室帝国形态。现在，经济与信息王牌又同样将以世界化形态替代国家形态。

历史上，政治宗教曾经屡领风骚，但也暴露出不少弱点；当今，经济信息似乎同样颇有称霸世界的势头，可是也同样表现出其极限。

“过去、现在、将来”一脉相承，离不开人类的政治、宗教、经济、信息等各项针对性适应活动，这些活动实践导致了部落、王室、国家、世界等各社会形态的变更。莫兰(Edgar Morin)在1980年就此发表专著“从部落到王室，帝国的绝妙转变”。波朗易(Polanyi)1986年的“大变迁”<sup>10</sup>也分析了从王室到国民政府的变革。当今，世界又正在走向世界经济一体化。

“个体、团体、社会”也同样联系在一起。要考察它们同样离不开宗教、政治、经济、信息等各种针对性适应传播活动及领域，这些活动导致了部落、王室、国家、世界等各种社会形态的更新。

史实难料。无疑，政治、宗教、经济、信息等各项历史活动及领域都无法得知它们是否

---

<sup>10</sup> Polanyi, A. (1986). *La grande transformation*. Paris: Gallimard.

一定得到最佳针对性适应-调适传播。到目前为止，我们也无法创造人类更具竞争力和挑战力的更完善的历史活动。然而，凭着已经积累的丰富历史经验和新兴知识方法，跨文化调适传播应当可以更好地担负人类未来的责任。

（翻译：王志杰）



# 建构跨文化传播新理念，担负人类未来

Jacques DEMORGON

##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responsable de l'avenir humain

Nous avons présenté par ailleurs une critique de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 classique » qui a permis de remettre en cause le sens même du terme « interculturel ». Il est constamment utilisé avec l'évidence que son sens s'impose tout seul. Or, il n'en est rien. Le terme « interculturel » concerne tellement de domaines qu'il peut donner l'impression de les recouvrir tous. Or, au contraire, « l'interculturel » dans son sens habituel apparaît comme largement réducteur. En effet, il ne sélectionne que les projets conscients et les mises en œuvre volontaires de relations et coopérations interculturelles. Dans la réalité, il délaisse tous les domaines où une interculturalité est bien mise en œuvre mais « *de facto* », du seul fait que des humains se rencontrent tels qu'ils sont avec leur culture. Ainsi, les longues relations, millénaires, entre peuples devenus sédentaires et peuples encore nomades se sont traduites par des affrontements extrêmes. La donnée interculturelle factuelle qu'est la frontière s'est durcie au point de devenir *Limes* autour de l'empire romain et Grande Muraille en Chine. Quand les Mongols puis les Manchous ont conquis l'empire chinois, ils se sont ensuite, à chaque fois, largement sinisés. Ainsi, des volontés d'affronter l'autre ont été *de facto* interculturelles même si aucune interculturalité n'était posée d'avance et voulue comme telle.

Ce faisant,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classique » s'inscrit dans un véritable déni de toute cette interculturalité factuelle le plus souvent extrêmement violente. Elle se positionne dans une sorte de moralisme selon lequel il n'y aurait d'interculturalité que non violente et de « bonne volonté ». C'est là une vision complètement fautive de la réalité qui conditionne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 classique » à faire comme si l'interculturalité violente n'existait pas.

Rien d'étonnant à ce que les acteurs de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 classique » ne soient pas en mesure de relever le défi de l'interculturalité violente. Il n'y a pas seulement à ajuster des hommes et leurs cultures dans les lieux de migrations, dans les équipes internationales de travail, dans les créations médiatiques mondialisées. Il faudrait encore plus les ajuster au plan des grandes oppositions entre les grandes activités humaines : religieuses, politiques, économiques, informationnelles. Il faudrait le faire au plan des grandes formes de sociétés : tribales, royales, nationales, mondiales qui, successivement apparues dans l'histoire, ne l'ont pas quittée mais s'y sont transformées en profonds courants culturels.

### 1/ Adaptation, « dissociation existentielle » et communication

On peut certes excuser les tenants de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 classique » dans la mesure où ils ne savent pas comment faire pour relier l'interculturel qui s'impose dans l'histoire et l'interculturel « volontaire » qui aujourd'hui fait l'objet de toutes leurs attentions.

En effet, pour y parvenir, ils auraient dû répondre à deux défis : établir une première « reliance » entre l'humain et les cultures ; et une seconde entre les personnes, les groupes et les sociétés. Or, ils n'ont su ni trouver ni inventer la clef de cette double reliance. Où se

trouve-t-elle ? Uniquement dans les exceptionnelles capacités d'adaptation et de communication de l'être humain.

Malheureusement, ils se sont barré d'avance ce chemin, dans la mesure où ils se sont faits une conception appauvrie de l'adaptation comme simple soumission au réel.

Bien au contraire, comme l'a souligné Eric Berne (1970), l'adaptation est à la fois acceptation, opposition, invention. Elle est ainsi fondamentalement problématique, c'est-à-dire qu'elle ne peut être en aucun cas un distributeur automatique de solutions. Encore faut-il découvrir que la source radicale de cette problématisation de l'adaptation et de la communication humaines se trouve dans une donnée structurelle du vivant redoublée de l'humain pensant : la « dissociation existentielle ».

Dans le vivant, en général, les espèces sont séparées entre elles et les individus le sont à l'intérieur de chaque espèce. L'être humain redouble cette séparation par celle de la représentation qui le constitue une seconde fois, séparé du monde, séparé des autres, séparé de lui-même.

## **2/ « La communication adaptative problématique », grande figure du vivant et de l'humain**

Dès lors, cette première division structurelle s'impose à la totalité des situations de son expérience. C'est ainsi, par exemple, qu'il va se trouver aux prises constamment avec une multiplicité d'adaptations et de communications problématiques.

Nous en donnons en annexe une liste, limitée à une quarantaine d'entre elles. Elles ont été mises en évidence à mesure que se développe l'histoire humaine avec ses actions et ses activités et les analyses scientifiques qui souhaitent en rendre compte.

Il y a un très grand intérêt à comprendre cette organisation des actions et des activités humaines autour des adaptations et communications problématiques. Seule cette organisation détient la clef de la relation profonde entre l'humain et les cultures. Il n'y a pas d'un côté l'humain en général, et de l'autre les cultures particulières et singulières, mais en même temps leur reliance plus fondamentale que leur distinction. Ce sont des acteurs humains qui, en présence d'une expérience faite d'oppositions – « ouverture, fermeture », « maintien, changement », « centration, décentration », « unité, diversité », etc. – peuvent parfois choisir une direction ou bien l'autre mais, le plus souvent, les composer, les harmoniser dans une adaptation difficile à l'unicité de chaque situation. Par exemple, il ne s'agira pas d'être « entièrement ouvert » ou « entièrement fermé ». Il s'agira de savoir comment, à un certain degré, ici ou là, être un peu « plus ouvert » ou un peu « plus fermé ».

Comprenons bien le caractère exceptionnel de l'adaptation et de la communication problématique. Cette problématisation n'est pas un défaut par manque de solutions déjà là, elle est, au contraire, un atout du fait de la possibilité de nuancer, d'ajuster précisément chaque adaptation momentanée, ponctuelle et locale. C'est donc un outil d'un grand raffinement qui a incontestablement permis à l'espèce humaine d'inventer son développement planétaire.

Jean Piaget (1967) a généralisé la problématique de toute adaptation à partir de deux grandes orientations générales. Par *accommodation*, l'être humain modifie, en partie au moins, ses structures mentales pour les faire coïncider avec celles que le monde ou les autres proposent ou imposent.

Par *assimilation*, l'être humain projette ses propres structures mentales sur la réalité externe pour la mettre mieux en rapport avec ses perspectives humaines.

Là encore, c'est chaque situation de l'expérience qui va requérir le bon dosage entre assimilation et accommodation pour produire l'équilibre singulier requis par telle situation unique. Piaget identifie à « l'intelligence » cette invention d'un meilleur équilibre.

En constituant le fondement de la reliance entre l'humain et les cultures, l'adaptation problématique fonde la reliance entre les dimensions intraculturelles et interculturelles. Comme on s'adapte déjà dans sa culture, on s'adapte aussi aux autres cultures (cf. 3).

Ensuite, l'adaptation problématique fonde la reliance entre les diverses conduites humaines et les contextes géohistoriques dans lesquels ces conduites se spécifient (cf. 4).

Enfin, l'adaptation problématique fonde la reliance entre personnes, groupes et sociétés au travers de ses trois expressions fondamentales : l'adaptation problématique des actions, l'adaptation problématique entre secteurs d'activités : religion, politique, économie, information ; l'adaptation problématique entre formes de sociétés : tribale, royale, nationale, mondiale (cf. 5).

Telle est, du simple au complexe, l'adaptation problématique constitutive de l'humain et de son devenir. Nous allons préciser ces différents points.

D'abord, voyons comment la communication adaptative problématique est une grande figure du vivant et de l'humain en tant quelle est présente à tout niveau du biologique au sociétal. Montrons-le sur deux exemples.

a/ L'adaptation problématique « *ouverture, fermeture* » s'exprime en biologie à travers l'impossibilité de la reproduction entre individus d'espèces différentes. La chirurgie des greffes nous a familiarisés avec leur rejet lié à la profonde fermeture du système immunitaire. En psychologie, de la fermeture à l'ouverture, on a une pluralité de « degrés » : l'hostilité, l'incompatibilité, l'indifférence, la sympathie, l'amitié, l'amour et l'intimité. Dans la vie des sociétés, « ouverture, fermeture » se traduit, au plan politique, par les frontières et les flux transfrontières ; au plan économique, par l'opposition entre libre échange et protectionnisme.

b/ L'adaptation problématique « *maintien, changement* » est mise en œuvre en biologie, dans la régulation qui maintient des constantes comme celle de la température ou accompagne des changements comme l'accroissement ou au rétrécissement de la pupille en fonction de la luminosité.

En psychologie, elle est au cœur des évolutions personnelles lentes ou brusques. En sociologie, elle est visible dans les conflits répétés entre Anciens et Modernes, concernant « tradition, novation ». Le plus souvent, il faut moins éliminer ou garder que modifier en transformant des données hier acquises en données plus adaptées aujourd'hui.

### **3/ Adaptation et communication sont intra et interculturelles**

Dans l'expérience humaine, les adaptations problématiques sont à l'œuvre sans que les acteurs en aient conscience. Mais quand l'histoire est réfléchie, les humains se réfèrent à leurs expériences opposées. C'est là qu'ils comprennent qu'au cours de leur histoire et de ses contextes, ils oscillent et recomposent sans cesse leurs actions de façon différente.

L'adaptation problématique générale est la même. Ce sont ses produits qui diffèrent d'un lieu à l'autre, d'un moment, d'une culture à l'autre. En ce sens, l'adaptation problématique fondamentale ne peut pas disparaître, elle est la forme régulatrice de tous ses possibles.

Soit l'adaptation problématique « *diversification, unification* ». Sans diversification, notre personne risque l'uniformité, l'appauvrissement. Sans unification, elle risque l'incohérence, l'éclatement.

Au plan des sociétés, après une période d'orientation vers la diversité, une société peut se voir conduite à l'orientation opposée vers l'unité royale ou, plus tard, nationale.

Selon les pays, les évolutions peuvent être inverses. Une « Allemagne », très décentralisée, au 19<sup>e</sup> siècle, peut se mettre en quête d'unité. Une France, très centralisée, au 20<sup>e</sup> siècle, peut tenter de se décentraliser en redonnant des compétences aux régions.

Entre les deux directions opposées d'unité ou de diversité, les adaptations effectives varient d'une situation à l'autre, d'un pays à l'autre. Si les acteurs humains font varier leurs

réponses pour s'adapter, ils peuvent comprendre que d'autres acteurs humains le fassent aussi. On est donc en présence de ce paradoxe : c'est précisément parce qu'ils sont semblables en tant qu'ils jouissent d'une liberté adaptative commune que les hommes sont différents parce qu'ils adaptent librement leurs réponses aux situations qui sont les leurs et qui changent.

Adaptations, communications et réponses culturelles restent problématiques *au sein d'une même culture* parce qu'elles doivent pouvoir continuer à y varier. En ce sens, les variations *d'une culture à l'autre* ne représentent pas un phénomène d'un autre ordre. L'adaptation problématique est tout autant interne qu'externe, tout autant intraculturelle qu'interculturelle.

Prendre conscience du fait que les humains disposent de cette possibilité de se référer ensemble à des adaptations problématiques communes - qu'ils traitent différemment ou semblablement - constitue un grand progrès. C'est à partir de là que leurs coopérations et communications culturelles peuvent prendre un tour inventif, voire tout à fait novateur.

Sur cette base, les humains pourront mieux aborder demain leurs oppositions et contradictions. Ils savent que, si leurs choix culturels sont différents, ils les ont, cependant, faits au cœur de grandes adaptations problématiques données ou construites dont, au moins *a posteriori*, ils comprennent qu'ils les partagent.

#### **4/ Adaptations problématiques entre elles et genèses historiques des cultures de communication**

A propos de notre mise en évidence du caractère fondamental de l'adaptation problématique, il est intéressant d'observer que les psychosociologues internationaux de l'interculturel, comme Hall ou Hofstede, ont toujours analysé les échanges interculturels courants à partir d'oppositions entre deux directions d'action, par exemple : « distance, proximité », « court terme, long terme ». Mais ces chercheurs n'ont utilisé ces oppositions que pour en tirer des compositions culturelles hiérarchisées, voire même chiffrables, en rapport avec les cultures nationales. Cette caractéristique culturelle « nationale » est supposée transmise par l'éducation.

Ils ont ainsi occulté la profonde adaptation humaine, à chaque fois requise pour la production de ces réponses différentes.

Ces chercheurs se sont aussi relativement dispensé de rechercher comment ces réponses culturelles différentes pouvaient dépendre de la géographie et de l'histoire des pays (Demorgon, 2002).

Il y a toutefois une adaptation problématique bien reconnue par Hall (1984). Elle a lieu entre deux pôles de la communication : l'implicite, usant d'allusions, et l'explicite, usant de définitions. Par contre, Hall ne s'est pas soucié de découvrir comment cette adaptation problématique, propre à la communication chez tous les humains, avait pu conduire, historiquement, à des cultures de communication plutôt implicites en France ou au Japon, et plutôt explicites en Suisse, en Allemagne et même aux Etats-Unis.

Il faut, pour le comprendre, croiser entre elles, et avec les contextes géohistoriques, plusieurs adaptations et communications problématiques.

a/ Une société entière s'oriente vers une plus grande fréquence de communication implicite lorsque ses membres constituent des références culturelles communes rapidement comprises. Or, une société ne peut produire beaucoup de références communes que si elle construit de mieux en mieux son unité au cours de son histoire. C'est le cas de la France avec la romanisation, avec la royauté catholique (expulsion des protestants) puis avec la République (régions toutes re-découpées en départements, instruction publique obligatoire). C'est le cas du Japon qui, pendant deux siècles et demi, refuse de laisser entrer les étrangers.

b/ Une société entière s'oriente vers une plus grande fréquence de communication explicite lorsque ses membres continuent de produire des subcultures différentes en raison de



relatives autonomies politiques. C'est le cas pour l'Allemagne. Ainsi, en 1648, peu avant le règne de Louis XIV en France, les pays de langue allemande sont au nombre de 350, petits, moyens ou grands, avec chacun une certaine singularité culturelle.

Si chaque interlocuteur qui voyage n'utilise que de ses propres références culturelles « régionales », il risque de choquer, d'être mal écouté et mal compris par ceux qu'il rencontre dans les autres régions. S'il veut se faire comprendre, il lui faut être très explicite.

c/ On voit que se croisent ici plusieurs adaptations problématiques. Entre sédentarité et mobilité, entre expressivité et réserve, entre unité ou diversité sociopolitique ou culturelle, entre communication implicite ou explicite.

Les études de Todd (1999) sur les structures familiales apportent ici l'indispensable éclairage, par exemple dans le cas de la communication explicite en Allemagne. Ses travaux ont mis en lumière la très grande généralité de l'héritage inégalitaire : un seul enfant succédant aux parents dans la ferme familiale. Les autres enfants doivent la quitter et partir dans les autres régions allemandes à la recherche d'un travail, d'un logement, d'une épouse. Comment seront-ils compris, si dans ces différentes subcultures ils ne s'expriment pas de la façon la plus explicite possible ?

Il est donc bien clair que, si la culture de communication d'une société devient, statistiquement, plus explicite ou plus implicite, c'est que la pratique de communication de ses populations s'oriente plus souvent dans un sens que dans l'autre.

Plus souvent, mais pas toujours, car des populations, de communication plus implicite, peuvent encore produire une « communication explicite » si nécessaire : des enseignants français en charge de disciplines nouvelles pour leurs élèves, devront bien user d'une communication explicite.

De l'autre côté, des populations, de communication plus explicite, peuvent encore produire une « communication implicite » si nécessaire : en famille, des Allemands, partageant un même contexte, devront bien user d'une communication implicite.

On voit que les cultures sont certes des biais dans les conduites, mais non des « programmations mentales », selon la formule excessive d'Hofstede (1987).

On voit aussi qu'une méthode « compréhensive explicative », transdisciplinaire, est ici requise associant les sciences de la conduite humaine avec la géographie et l'histoire (Demorgon, 2004).

## **5/ Méta communication et métacognition : l'invention des adaptations problématiques**

Pour une part, les adaptations problématiques sont déjà inscrites dans la nature comme résultats d'une histoire de la vie qui a précédé puis accompagné l'apparition des humains. A l'opposé, elles peuvent être seulement en train de s'inscrire diversement dans les cultures comme résultats d'une histoire humaine diversifiée. Dans ce cas, les adaptations problématiques sont des « donnés construits » à partir des multiples expériences de l'histoire humaine, réfléchies par des humains, ensemble ou séparément. « Donnés » parce qu'elles ne sont pas des illusions de l'analyse, elles reposent sur des réalités ; mais « construites » parce que leur structuration, avec la simplification qu'elle comporte, est un produit de l'intelligence humaine.

Chercher le commun entre humains du côté de la nature ne convient pas vraiment à la singularité profonde de l'espèce humaine. En ce qui la concerne, le commun de son « être en devenir » n'est pas déjà tout donné, il ne peut être que produit comme intelligibilité nouvelle. L'intelligence, « *toujours en développement, indéfiniment partageable* », est la seule vraie « ressource » commune. C'est elle qui œuvre à partir du constat des différences et de l'épreuve des « différends ».

C'est cela qui donne à la métacommunication et à la métacognition un rôle fondamental dans la construction partagée de l'expérience humaine. Le grand linguiste

Roman Jakobson (1963) a mis en évidence la fonction métalinguistique de la communication. Elle permet de revenir sur les messages échangés pour s'assurer de leur bonne fabrication et de leur bonne réception.

Toutefois, il faut aller plus loin en direction de la métacognition. Celle-ci prend en charge non des insuffisances de la communication mais des insuffisances dans nos représentations mêmes du réel.

Les adaptations problématiques sont ainsi produites au travers des échanges humains non seulement du fait de ce qui est mal entendu ou mal dit, mais mal pensé.

Les adaptations problématiques sont une figure de la recherche d'un « mieux pensé ». Il arrive que l'on puisse voir, en partie, s'opérer cette construction des adaptations problématiques.

À la fin du dix-neuvième siècle, Ferdinand Tönnies publie *Communauté et société* (1887). La communauté est la première forme de composition de l'ensemble social d'autrefois, et la société qui lui a succédé est la seconde. Mais Tönnies trouve aussi, à l'une et à l'autre, un sens humain général qui persiste hors du temps. « Communauté » et « société » sont deux orientations irréductibles de tout grand ensemble humain, s'il doit être mieux équilibré.

Plus tard, Louis Dumont (1977, 1979, 1991) distingue et situe, dans le temps et l'espace, des « sociétés holistes » et des « sociétés individualistes ». Selon Vincent Descombes (1999), dans l'esprit de Dumont, ce sont aussi deux orientations irréductibles de toute société humaine qui doit s'équilibrer.

On le voit, ces analyses, reprises sur un siècle, contribuent à la construction de l'opposition « collectif, individuel » comme une adaptation problématique de toute l'histoire humaine.

Autre exemple : le travail qu'accomplit François Jullien sur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entre Occident et Chine doit être compris dans cette perspective d'un « mieux penser » à partir des divergences des sociétés et de leurs cultures. Il cherche à mettre en évidence de nouvelles adaptations problématiques, hier inaperçues, aujourd'hui mal comprises et encore à construire. Il ne s'agit pas de décider qui, de la Chine et de l'Inde, ou de l'Occident, détient la vérité. En effet, c'est justement à partir de leurs divergences culturelles qu'une vérité supérieure est en jeu. Puissent ces sociétés s'en saisir à partir du trésor de leurs langues-cultures avant que leurs divergences maintenues sans être comprises ne les entraînent dans des catastrophes communes.

Prenons l'une des divergences étudiées par Jullien. Les humains établissent tous des différences entre les choses, entre les êtres, entre les situations. Il se trouve que l'orientation culturelle occidentale force le trait de plusieurs différences, les transforme en oppositions radicales, les dramatise même : « individu, société », « autorité, liberté », « inégalité, égalité », « animalité, humanité », « ici-bas, au-delà », « Dieu et diable », « salut et damnation ».

Les cultures de la Chine classique, de l'Inde aussi à bien des égards, visent plutôt à « jouer, déjouer » les oppositions pour accompagner et mieux comprendre la composition des infinies variétés du réel. C'est bien le cas au travers des associations dynamiques « yin, yang » avec ses multiples transformations.

« Jouer, déjouer » les oppositions, ou les rendre extrêmes, espérons que cette adaptation problématique poursuivra sa construction et contribuera à l'anticipation des catastrophes annoncées.

Avec Jullien, les humains devraient devenir plus attentifs aux modalités d'invention des adaptations problématiques, voie privilégiée pour construire « en humanité » nos ressemblances et nos différences.

## **6/ D'hier à demain : penser les adaptations et les communications interculturelles mondiales**

L'adaptation problématique humaine passe par l'adaptation des actions mais, en même temps, ces actions sont regroupées par activités qui peuvent grandement différer. Pas seulement entre chasse, pêche et cueillette ou, plus tard, élevage et agriculture mais, par exemple, entre activités économiques, qui regroupent les précédentes, et activités religieuses qui établissent des relations sacrées entre les êtres. Ou encore activités politiques, administratives et militaires. Ou enfin, plus tard, activités productrices d'informations : techniques, esthétiques, philosophiques, scientifiques, médiatiques.

Or, ces diverses activités, en raison de leurs caractéristiques, sont perçues avec des atouts spécifiques différents dont les humains qui s'y investissent se servent pour organiser la société comme ils le souhaitent. Il y a, de ce fait, opposition et rivalité entre les acteurs humains selon qu'ils investissent prioritairement telles activités.

Les adaptations et les communications problématiques qui en résultent sont encore plus complexes que celles concernant simplement les actions. C'est ainsi que les acteurs du religieux et du politique ont utilisé les atouts d'unification de ces secteurs d'activité pour entraîner les sociétés tribales à se constituer en royaumes. Ils ont en même temps contrôlé les activités d'économie et d'information.

Mais des rivalités et des dissociations ont aussi eu lieu entre acteurs du religieux et du politique, affaiblissant parfois ces royaumes et empires. D'autant que les acteurs de l'économie et de l'information estimaient disposer d'atouts permettant d'organiser les sociétés de façon supérieure. A mesure que ces acteurs faisaient la preuve de leurs atouts « modernes » et des pouvoirs nouveaux qui en résultaient, les royaumes et les empires se voyaient concurrencer par la nouvelle forme de société qui se constituait : la nation marchande industrielle à base de connaissances scientifiques, techniques, médiatiques.

Ainsi, les acteurs, s'appuyant sur les atouts de l'économie et de l'information, contrôlaient maintenant les acteurs de la religion et de la politique. Ces mêmes atouts économiques et informationnels ont pu récemment entraîner l'humanité de l'international au mondial.

Toutefois, hier, en se voulant exagérément dominants, les acteurs du religieux et du politique firent la preuve de leurs insuffisances. Aujourd'hui, les acteurs de l'économie et de l'information, en se voulant eux aussi exagérément dominants, commencent à faire la preuve de leurs limites.

« Passé, présent, futur » sont reliés mais ce n'est guère possible de les penser, avec rigueur et fécondité, sans se référer à cette dynamique des acteurs liés à la religion, à la politique, à l'économie, à l'information. C'est elle qui, au cours de l'histoire, a entraîné le renouvellement des formes de société : tribale, royale, nationale et mondiale.

« Formidable métamorphose des tribus en royaumes et empires » que souligne Edgar Morin (1980). « Grande transformation » des royaumes en nations marchandes analysée par Polanyi (1986) ; et, aujourd'hui, transformation en sociétés d'économie mondialisée.

« Individus, groupes et sociétés » sont, eux aussi, reliés et là encore ce n'est guère possible de les penser, avec rigueur et fécondité, sans comprendre qu'ils le sont au travers de ces trois grandes figures de l'humain : l'adaptation problématique des actions, celle des secteurs d'activité : religion, politique, économie, information : et celle des formes de société avec leurs orientations : tribale, royale, nationale et mondiale.

Pour autant, rien n'est absolument prévisible. Certes, il apparaît que la religion, la politique, l'économie, l'information ne peuvent prétendre obtenir, chaque à elle seule, les meilleures adaptations et communications humaines.

Cependant, jusqu'ici, nous sommes incapables d'inventer ces grandes activités humaines historiques pour qu'elles puissent, de concurrentes et conflictuelles, devenir mieux complémentaires.

On a cependant déjà réuni certaines conditions de connaissance et d'action nouvelles pour que, désormais, au travers de leurs adaptations et communications interculturelles, les acteurs citoyens aient des chances d'être plus responsables d'un avenir « humain » (Demorgon, 2005).

\*

### **Annexe : 32 exemples d'adaptations problématiques**

\* évoqués dans le texte

#### **1/ Relations et communications**

- 1/ Fermeture/ ouverture \*
- 2/ Objet/ sujet ;
- 3/ Réserve/ expressivité \*
- 4/ Contenu/ relation \*
- 5/ Individuel/ collectif \*
- 6/ Accommodation/ assimilation \*
- 7/ *Consensus/ dissensus*
- 8/ Emulation/ séduction
- 9/ Implicite/ explicite \*

#### **2/ situations, espaces-temps perceptions**

- 10/ Intérieur/ extérieur
- 11/ Figure/ fond
- 12/ Proximité/ distance \*
- 13/ Grand/ Petit
- 14/ Passé, présent, futur\*
- 15/ Instant/ durée
- 16/ Maintien/ changement \*

#### **3/ Actions et opérations**

- 17/ Exercice/ repos
- 18/ Centration/ décentration \*
- 19/ Actualisation/ potentialisation
- 20/ Organisation/ spontanéité \*
- 21/ Risque/ précaution \*
- 22/ Action/ représentation
- 23/ Ressemblance/ différence \*
- 24/ Structure/ genèse

#### **4/ Activités, institutions**

- 25/ Unité/ diversité \*
- 26/ Nomade/ sédentaire (cf. texte I)
- 27/ Endogamie/ exogamie
- 28/ Tradition/ novation \*
- 29/ Profane et sacré
- 30/ Autorité/ liberté\*
- 31/ Inégalité/ égalité\*
- 32/ Privé/ public

\*

### **Adaptations et communications problématiques supplémentaires**

- « Multiculturel, transculturel, interculturel » (adaptation ternaire).
- « Tradition, novation », en relation avec « maintien, changement ».
- « Jouer, déjouer les oppositions » ou les « radicaliser ».
- « Libre échange, protectionnisme ».
- « Court terme, long terme » en relation avec « instant, durée ».
- « Action, information » en relation avec « risque, précaution ».

\*

### **Bibliographie des auteurs et ouvrages cités**

- Berne E., 1970, *Analyse transactionnelle et psychopathologie*, Paris, Stock.
- Demorgon J., 2005 , *Critique de l'interculturel. L'horizon de la sociologie*, Paris, Economica.
- Demorgon J., 2010, *Complexité des cultures et de l'interculturel. Contre les pensées uniques*, Paris, Economica.
- Demorgon J., 2002, *L'histoire interculturelle des sociétés. Une information monde*, Paris, Economica,
- Descombes V. (06-1999) "Louis Dumont ou les outils de la tolérance", in *Esprit*, pp. 65-85.
- Dumont L., 1966-1991, *Homo hiérarchicus, Homo aequalis* I, II, Paris, Gallimard.
- Fernandez B., 2002, *Identité nomade – De l'expérience d'occidentaux en Asie*, Anthropos.
- Hall E.T. , 1991, *Guide du comportement dans les affaires internationales*. Paris, Seuil.
- Hall E.T., 1984, *The Dance of life*. N.Y., Doubleday, 1983.
- Hall E.T., Hall M., 1984, *Les différences cachées. Une étude de la communication internationale. Comment communiquer avec les Allemands ; - Verborgene Signale. Studien zur internationalen Kommunikation. Über den Umgang mit Franzosen*, Hambourg, Stern.
- Hofstede G., Bollinger D., 1987, *Les différences culturelles dans le management*, Paris, Editions d'organisation.
- Jakobson R., 1963, *Elément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Paris, Minuit.
- Jullien François, 2008, *De l'Universel, de l'uniforme, du commun et du dialogue entre les cultures*, Paris, Fayard.
- Piaget Jean, 1967, *Logique et connaissance scientifique*, Paris, Gallimard.
- Polanyi A., 1986, *La grande transformation*, Paris, Gallimard.
- Todd E., 1999, *La diversité du monde. Famille et modernité*, Paris, Seuil.
- Tönnies Ferdinand, 1977, *Communauté et société*, Paris, Retz.

\*



